学林

小学金石的异域趣味

——中国之埃及学前史补述(上篇)

胡文辉

郭嵩焘或是中国人最早提及罗塞塔碑者,而陈其镳或是中国人最早将罗塞塔碑碑文中译者。中国人甫一接触埃及及其遗物,就很关注其文字,并与汉字对照。文字学(小学)在中国有深厚传统,至清代尤为显学,而且汉字与埃及文字(圣书字)皆有直观的“象形”特征,中国人自容易有“惺惺相惜”的反应。

近见潘佳《中国人何时开始研究埃及文物》一文(“文汇学人”2018年12月10日),对晚清潘祖荫苦求埃及文物事迹作了梳理,得出结论:“‘中国人开始搜集埃及古文物,研究埃及学’至少可上溯近二十年,即潘祖荫主动托人寻找搜集古埃及文的光绪十四年(1888)前后。或许可以说,以潘祖荫古埃及文石刻收藏为中心的学人对古埃及文的搜访和研赏活动,就是中国埃及学的先声。”

潘先生对潘祖荫有关本事的考掘细致丰富,得未曾有,但不及其他。以我所知,除了作者提及的刘文鹏《埃及学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有关论著尚有李长林《古埃及造型艺术在中国的流传》(《寻根》2004年第2期),引述了端方、康有为;王海利《法老与学者——埃及学的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九章“埃及学在中国”引述了张德彝、王韬、郭嵩焘;张晓川《古埃及人是黄帝后裔·晚清外交官的“埃及热”》(“澎湃新闻”2017年10月8日),引述了斌椿、郭嵩焘,并点到李圭、崔国因、王韬、张荫桓、端方——他还提及《埃及五千年石刻》《希腊埃及时代棺铭考释》两种单行著述。

对此问题,我也偶有关注,陆续积累了一些资料,今参考诸家提供的线索,以排比材料为主,尽量详人所略,作一补述。

一

首先,将“中国人开始搜集埃及古文物,研究埃及学”追溯到潘祖荫,还不尽准确。张德彝、王韬、郭嵩焘诸人,游历欧洲都在同治年间,是为中国人接触埃及文物之始。

同治六年(1867),王韬随理雅各赴欧,至巴黎记所见云:

有埃及石柱一,高可十六七丈,广可八九尺,下阔而上锐,四镌埃及上古文字,几于剥泐不可识,相传三千年之古物也。……余近临柱下,拂拭而观之。埃及字有若云形,殆古之‘云师而云名’者,黄帝氏之苗裔欤?惜无好事者手拓其文,携至中国,俾识古博览之士一考求之。(《漫游随录》卷二“法京古迹”,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85-86页)

由此可知王韬在埃及遗物的“现场”,已萌生了搜集拓本的意识。

再看郭嵩焘,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使英国,在光绪二年(1876)过苏尔士运河,其日记云:

马格里及刘云生各购得挨及古迹图数幅,中有克里阿卑得拿尼得尔图两幅,盖一石柱,高七八丈,四方,方各七尺许。马格里得其前方,云生得其后、左二方。上有尖顶,每方各为鸟形三平列,其下为字三行,每行十余字。字体大逾二尺,绝类钟鼎文及古篆籀。属黄玉屏摹出之。……其柱不知始何时。挨及自古有贤后克里阿卑拿,以此石柱顶尖,遂相颂赞,以为古里阿卑拿所用之针。尼得尔者,译言针也。乃知文字之始,不越象形、会意,麦西(按:Mizraim,埃及异称)始制文字,与中国正同。中国正文行而六书之意隐,西洋二十六字母立,知有谐声,而象形、会意之学亡矣。(钟叔河、杨坚整理《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74-75页)

马格里系英籍随员,刘云生即副使刘锡鸿。据整理者注,“克里阿卑得拿尼得尔”,即Cleopatra's Needle,意为克娄巴特拉之针。马格里、刘锡鸿分别购藏了此遗物的图片,同时郭嵩焘又让属下另摹写了一份。

又郭嵩焘在伦敦任上时,结识了英国埃及学专家“百尔治”(Budge,今译伯奇),其光绪四年(1878)日记有云:

英国百尔治,博通挨及之学。……百尔治为考证古碑原始,枉送一帙。据称碑名克里倭稗得拉(按:即克娄巴特拉),用古挨及后为名。其碑莫知其原始,向在希里倭波雷司,挨及一大都会也。古名之得徵,取掩盖之义,疑以置之墓道者。……其碑高六丈八尺六寸,四方如柱而顶锐。四方二面亦微有参差,一面广七尺五寸,一面广七尺十寸半。顶方,四面肖一人一兽:人名登摩,西洋各国各有护国神,登摩者,所指为保护西里倭波雷司者也;兽名斯芬克斯,身如狮子,人面。挨及古图及古宫殿遗式多为此种兽形(今狮子横目而颔下微丰,其形似人,疑即今狮子也)。柱端四方,方各为三鸟,而文字列其下。(《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51-452页)

罗塞塔碑由1799年法国占领军于埃及发现。此碑以埃及圣书体、世俗体及希腊文三种文字书写,为释读埃及古文字的关键,在埃及学史上声名赫赫。法国人商博良因破译罗塞塔碑而声名卓著。

所谓“百尔治为考证古碑原始,枉送一帙”,似指伯奇甚重郭嵩焘的中国背景,为听取其见解,特意赠送予他这份古碑的图像资料。

可见刘锡鸿、郭嵩焘已有了搜集文物资料的实践,只不过他们非如潘祖荫、端方那样专于金石学,尚欠缺一点学术自觉。但这似乎也称得上是“中国埃及学的先声”。

此外,稍后于潘祖荫,黄遵宪也在海外游历时特意搜集过埃及文物。他有一函致梁鼎芬云:

埃及为四千年故国,有古碑铭,篆如石鼓文,画如武梁祠,朴拙幽秀,实为宇内第一古物。遵宪于辛卯九月泊舟阿丁,遍搜市肆,得写本不及廿幅。后托友再购,亦不可得,既分十数叶赠文三芸阁,今仅以四纸呈公,亦颇踌躇,不忍割爱。(此据梁基永《广东文人的埃及情结》,《南方都市报》2011年12月27日)

“辛卯”即光绪十七年(1891)。由此信可知,不仅黄遵宪对埃及古物有兴趣,其友人文廷式、梁鼎芬也闻风而起。

再后的己酉年(1909),康有为也去过埃及,并留下多篇诗作,篇目如下:《游埃及开罗京》《开罗外访金字陵》《游埃及录士京》《游亚士浑故京》《循尼罗江流数千里,石山平长,平如两岸》《埃及行》《埃及棺盖露首戏拓影像自题》(《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276页)。其中《埃及棺盖露首戏拓影像自题》一首云:

盖棺论定是何人,后死斯文话劫尘。了尽人天偶乘化,此心未死死心新。(自注:宋名僧有死心新,于帐中悬死字自警,因以死心为名)

由此诗之题,即可知康有为亦有摹拓埃及文物之举。而且,据说康氏藏有不少埃及碑刻照片,往往作题跋以赠予友好,尤其是遗老(梁基永《广东文人的埃及情结》)。

在近代史上,“康梁”并称,而在埃及文物收藏方面,梁启超似乎也有追步康有为的意思。据杨鸿烈回忆:

梁氏对于三代钟鼎彝器一类的古董似乎没有特别搜集的嗜好,惟某次在他的书桌上摆着一个大且长的酸枝木匣子,装着一个明末清初大汉学家顾亭林的墨宝手卷……此外梁氏又曾把他从非洲埃及的金字塔和欧洲意大利邦俾(按:庞贝)古城所得的砖石,放在外客厅里特制的玻璃匣内,亲笔加以说明解释,这便说明他足迹所

(下转11版)